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乐黛云 主编

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

王兆胜 著



文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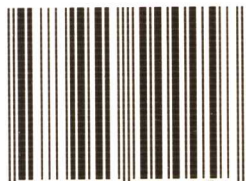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封面设计：张守义



ISBN 7-80554-445-X



9 787805 544458 >

ISBN 7-80554-445-X/K · 59

定价：16.00元

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

王兆胜 著



天津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选题策划：徐 迅 龙 杰

责任编辑：李君伟 刘 芳

责任印刷：李文宗

封面设计：张守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 / 王兆胜著. —
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乐黛云主编)

ISBN 7 - 80554 - 445 - X

I. 林… II. 王… III. 林语堂(1895~1976)—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2768 号

·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林语堂 两脚踏中西文化

LIN YUTANG LIANG JIAO TA ZHONGXI WENHUA

乐黛云 主编 王兆胜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 津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9×1230 32 开本 7.25 印张 18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 - 80554 - 445 - X

K · 59 定价：16.00 元

总 序

乐黛云

21 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20 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





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会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本丛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着重个案研究，意在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突出他们对中外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跨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一流专家学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功力，是继20世纪

初沟通中西文化的钱钟书、季羨林等大家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基本上做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本丛书志在这方面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总
序

目 录

引言 两脚踏中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1)
第一章 中西文化背景	(10)
一、地域文化环境	(10)
二、家庭的熏陶	(18)
三、游学旅居纪历	(25)
第二章 亦中亦西的生活	(33)
一、衣、食、住、行和娱乐	(33)
二、兼容的原因和方法	(42)
三、价值意义与局限性	(50)
第三章 情感的传统与现代	(56)
一、血缘亲情	(56)
二、婚姻爱情	(63)
三、亲朋好友	(73)
第四章 人生智慧的寻求	(85)
一、生命的本质悲剧性	(85)
二、幽默的情怀	(90)
三、诗化人生	(100)
第五章 文化的桥梁与使者	(106)
一、中外文化“对讲”	(106)
二、双语作家	(119)
三、异同比较与取长补短	(125)

第六章 文学世界的相互印证	(131)
一、打碎“格套”与独抒“性灵”	(131)
二、“娓语文体”的风姿	(139)
三、辞达而已	(147)
第七章 艺术上的互通有无	(156)
一、游戏的艺术观	(156)
二、东方艺术的优劣	(161)
三、西方艺术的长短	(168)
四、东西兼容并顾	(173)
第八章 思想信仰的会通	(178)
一、“一捆矛盾”	(178)
二、冥冥之中有“真宰”	(182)
三、和谐的审美理想	(187)
结语 西洋头脑与中国心灵	(192)
参考文献	(199)
林语堂大事年表	(206)
后记	(220)

引言 两脚踏中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

应该说，中国人热衷于谈论中西文化是近现代以来的事情，是与当时中国由堂堂大国转而成为腐败无能的弱国这一变局密不可分的。试想，在盛唐、强元和康乾的时代，中国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而视他国为“番夷”，他们何曾将中国与他者相提并论？当西方的坚船利炮不费吹灰之力即将中国的国门打破，就连只有蕞尔小岛的日本，由于向西方学习而转瞬间即将老大中国的“霸主”美梦击得粉碎时，中国人才幡然猛醒，一些志士仁人才开始思考中西之间的差距，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为了保国强民，不得不从西方大胆地“拿来”，开始是“科技救国”，后来是“制度救国”，再后来过渡到“文化文学启蒙”，这是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所经过的大致路向。

20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曾指出中西文化带给当时中国青年的困惑，她说：“我们几乎是饶有兴致地看到，一些青年决心做真正的中国人，他们的自我意识是那么强烈，吃中国餐、穿中式服装、照中国的习惯行事。这些已经西方化了的青年人又要使自己完全中国化了。这无疑是一种时髦，装模作样，与父辈当时穿西装、用刀叉、一心去哈佛留学的时髦，性质别无二致。这些青年人一生都在穿西装、吃西餐，而且也曾去过哈佛，他们的英语文学知识远远超过了本国文学。现在对这一些都反感，要回到自己祖先那儿去了。”^①直到今天，当历史进入了21

^① 赛珍珠：《中国人·序》，5—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世纪，中国人仍然没有走出中西文化所设定的怪圈。

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当前的世界强国相比，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这种现实处境就决定了中国不得不更好地面对甚至迎对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迫压；二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自近现代以来偏于中、西两极的一元化价值取向一直占据上风，而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一直没有得以确立。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来得更为重要和急迫，因为在建设现代化中国的过程中，我们既目标明确，观念统一，又成效显著；而在解决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所做的工作却大为逊色，呈现出极其忽视、混乱和简单化的特点。这一局限性即使在许多思想文化先驱身上也非常突出地表现出来。不解决这些问题，中西文化困境的“瓶颈”就难以突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如对于东西文化的调和融通，梁漱溟曾持否认态度，他说：“大家意思要将东西文化调和融通，另开一种局面作为世界的新文化，只能算是迷离含混的希望，而非明白确切的论断。像这样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一般人的议论——其实是毫无准据的想像——异口同声说世界未来文化必是融合了东西两方文化而产生的；两方文化各有所偏，而此则得其调和适中的。这全因为他们心思里有根本两谬点。”^① 还有季羨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说，也是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与东西文化融合观是有距离的。

看到中、西文化某些方面的差异，大胆地借鉴西方先进的技术、知识、制度乃至思想文化，从而为中国古老的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使其更加生机勃勃和坚强有力，这是对的。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却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泥潭：或是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为标准简单地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而形成所谓的文化激进派；或是死抱住中国传统文化不放，对西方文化采取拒斥甚至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20页、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诋毁的态度，从而形成所谓的文化保守派。这两者形同水火，在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互相争斗、缠绕和攻伐，成为一股巨大的文化洪流。

文化激进主义者认为，中国古老的文化到近现代已经趋向穷途末路，它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是彻底的革命，必要的时候即使“换血”甚至“扔掉”也在所不惜，于是“欧化派”甚嚣尘上。在这中间，比较有代表性是吴虞、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等人，他们虽有着这样和那样的区别，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高度张扬这一方面并无二致，而且在措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决、思维之偏执上，也如出一辙。

胡适 1917 年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建议，此虽被郑振铎称之为向中国旧文学“发难的信号”，但其态度还是温和的，这在 1917 年 4 月 9 日胡适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胡适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主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① 对此，陈独秀在回信中却态度强硬地指出：“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② 陈独秀一面说学术发达的原则是“自由讨论”，一面又在文学革命上强调“专断独行”，不容讨论，这既反映了内容的矛盾性，又反映了一元化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借狂人之口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

① 参见胡明：《胡适传论》，上卷，32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② 陈独秀：《独秀文存》，689 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将数千年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虽然深刻但偏激是显见的。在《青年必读书》中，鲁迅又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于是，鲁迅得出结论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① 鲁迅还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② 这种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不管出于何目的，其偏激与后果可想而知！试想，如果中国人不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那中华民族将如何发展？

如果说鲁迅对待中国文化毕竟还建立在他自己的逻辑上，而有时又对自己的偏激进行纠偏，那么钱玄同等人就更为偏激，有时还显得不合情理，过于信口开河，反映出在中西文化选择上的“幼稚病”。最明显的例子是，钱玄同呼吁将中国古书都扔到茅厕里去。他还对陈独秀说：“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③ 今天，对于钱玄同等人的意见，已少有人表示赞同，但其影响力却是深远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厚西薄中，崇洋媚外和非此即彼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

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过于看重中国传统文化，而对西方文化采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② 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见《鲁迅选集》，第4卷，34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③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16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取“闭关”的态度，这是偏激思维方式的另一表现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琴南、刘师培、黄侃、胡先骕、章士钊和辜鸿铭等人。不顾世界文化的发展，抱残守缺，必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汉唐文化不能对夏商文化墨守成规，同样地，20世纪也不能重复10世纪的文化。有活力的文化及其文学必须革故更新，在兼容并蓄的前提下，将自己的国粹发扬光大。

应该注意的是，文化保守主义者重视国粹还情有可原，但他们有人竟将糟粕也视为国粹，加以崇拜。如辜鸿铭对中国古代的纳妾、缠足等恶习大加欣赏，足见其现代意识的匮乏！他这样解释说：“中国的‘妇’字，本来就由一个‘女’和一个‘帚’两部分构成。古代中国人把妇女称作一个固定房子的主人——厨房的主人（主中馈），毫无疑问，这种真正的女性理想——一切具有真正而非华而不实文明的人们心中的女性理想，无论是希伯来人，还是古希腊和罗马人，本质上都与中国人的女性理想一样。”他还将“妾”解释为“站着的女子”，又说：“关于这个纳妾问题，我要讲的第一件事，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它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① 如果从中国文字学角度说，辜鸿铭的解释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中国文字本身就是象形文字，用来表情达意的。即使如此，辜鸿铭也不能将它们拿来作依据，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说还是男权文化的产物，它当然是无视女性的个性、价值和尊严的。从中可见辜鸿铭在中西文化选择上的迷失。

林语堂与以上两派都有关系，在他身上既有文化激进主义者的“欧化”倾向；又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国粹迷恋。如林语堂早在1925年即倡导“欧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极力批判，并自认自己身上有着浓厚的“哈佛味”。他说：“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

①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72页、74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先生的‘欧化的中国’…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唯一的救国方法，明白浅显，光明正大，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弟近有‘孙中山非中国人’（即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的中国人）之论，其见地主张，完全与先生所持一致。……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①又如林语堂曾对纳妾和妓女制度含有某些赞赏与期许，虽然他并不似辜鸿铭有着明目张胆的宣言，而只是透出几分意思，^②但从中可见林语堂与辜鸿铭的内在关联。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即林语堂与众不同的卓越之处，就是超越对中西文化的肢解式理解，赋予其多元整合的文化思想。在早期这一倾向初见端倪，而越到后来越为明显。如林语堂在1934年说：“吾近作《语言学论丛》，发源自序，也有忏悔语，而顺便骂人。忏悔的是说：初回国时，所作之文，患哈佛病，声调太高。”^③同时，林语堂对东西（包括中西）文化关系还作了最著名的论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句话被嵌在写于1934年的《我的话·杂说》五则联语中，其内容如下：

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① 林语堂：《翦拂集》，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② 见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172—1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③ 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281页，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领现在可行之乐，补平生未读之书。^①

写下这段话时，林语堂正好四十岁，属于中国人常说的不惑之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对东西文化关系能够开悟也是情理中事！值得指出的是，林语堂这一文化思想也并非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因为在它之前也有不少人关注和探讨了这一问题。如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中希望东西文化调和融通；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说东西文化各有短长，有融合之可能和必要；连杜威和罗素也认为中国文化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将来东西文化有调和融通的希望。只不过，如何调和融通他们却没有进一步展开探讨。林语堂深受这些人的影响，所以，其东西文化沟通和融会的思想当然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源头。

不过，林语堂提出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具体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一元化思维方式的突破。它超越了长期以来对东西文化“非此即彼”的单面式理解，而是对不同的文化方面进行融会整合。二是时空的扩展与延伸。以往许多人局限于“中”、“西”，而林语堂在此谈的是“东”、“西”；另外，“宇宙”一词的引入显示了林语堂博大浩瀚的胸襟，这非一般目光如豆者所能及，许多文化大家也难出其右。可以说，只有以这种天地之心为前提方能产生天地至文。三是心灵的力量。林语堂在此看重的不是逻辑的力量，而是以“一心”来评宇宙的文章，通过强大的心灵之光进行烛照和感悟，没有智慧决然不办。四是文化的理性自觉意识。虽然只有十四字的东西文化关系箴言，但其中却充满个性的理性自觉，不含糊，不游移，不铺陈，而且明晰、简凝、有力。也可以这样说，就我所及的范围看，直到今日对东西文化关系描述之精彩神妙，还没有谁能超过林语堂。而从1934年至2004年，时光却已走过

① 林语堂：《行素集》，4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了整整七十年！令人遗憾的是，林语堂这一伟大的贡献却少有人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有效的开发。

更有甚者，还有人简单地将之全盘否定，视之为不足一观。如陈平原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着眼于东西文化综合，努力于以东方文化拯救人类，在西方产生一定影响的‘东方哲人’，一是以儒家救世界的辜鸿铭，一是以佛教救世界的梁漱溟，再就是以道家救世界的林语堂。”“在建立世界文化理想上，林语堂的东西综合是失败的。”^①且不论陈平原以“道家文化救世界”来概括林语堂是否确当，只简单地将其冠以“综合”与“失败”的结论就很值得商榷。因为在文化和文学上，有些东西不能只以“成”、“败”论，更不能将短暂时间内产生的效果作为检验标准。

我们当然不能说在实践层面，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融会思想产生多少明显的效用，尤其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说更是如此。但完全忽略了这种作用和影响，尤其简单地否定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却是不对的。林语堂在国际上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这“下”可以自平民百姓，“中”可以从作家文人，“上”可以达总统官员，都可作如是观。如1942年，一名被日军俘虏的十九岁新加坡战士西登·皮尔顿在狱中用了两个月时间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一书读完。他读此书的欣喜若狂、细嚼慢咽和对人生的彻悟是难以言尽的，一句话：“《生活的艺术》使这位年轻的战俘在绝望的痛苦中获得了生活的勇气”。^②台湾作家林海音在《林语堂著作等身》一文中称：“本世纪的中国人能成为世界性作家学者的，我以为只有林语堂一人。在欧美或东亚，提起 Dr. Lin Yutang（即林语堂博士——笔者注），尽人皆知。”^③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讲演时曾说，他在准备访问东亚的过程中，看

① 陈平原：《在东西文化碰撞中》，53页、34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② 参见施建伟：《林语堂传》，404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③ 萧然编选：《衔着烟斗的林语堂》，41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